

秘密的形式：電子影像美學與政治性 (II)

謝佩君

乍看之下，帕格倫 (Trevor Paglen, 1974-) 的「遠距攝影極限」系列 (Limit Telephotography, 2005至今)，仿若一系列拍壞的照片。儘管每一幅照片的題名都近乎強迫症般地清晰：像是《生化武器試驗場，猶他州道格威市，拍攝距離約四十二英里，上午十一點十七分》(Chemical and Biological Weapons Proving Ground; Dugway, UT; Distance approx. 42 miles; 11:17 a.m., 2006)，影像本身卻是一片朦朧。被美軍用作生化武器實驗場域，阻絕公眾進入與拍攝的猶他沙漠景象，被輾平成一則抽象的研究，藍天、雲朵與沙地的分界是有著毛邊的色塊。這讓明確標注的事件、地點、時間、拍攝距離與時間的影像標題，與其說是闡明事實，倒不如說是揣測或想像。同時，「生化武器試驗場」的抽象形式，讓帕格倫置身於地景或是調查式攝影的傳統，和十九世紀的攝影家歐蘇利文 (Timothy O'Sullivan) 或是威金斯 (Carleton Watkins) 一樣，鏡頭下的影像既是帝國疆域的標記與征服的證明——不宜人居的沙漠地帶既是實驗毀滅的孤立場域，也是攝影作為藝術的形式練習。

然而，帕格倫的抽象形式無比模糊。當眼前的地景未能準確地再現事件，也非是單純、抽象表現主義式的審美對象，如此朦朧的視覺經驗，讓帕格倫的地景作品悖離於任何攝影理論：模糊的影像逃離了國家機器召喚、游移於真實效力，也未在天文望遠鏡頭的協助下將任何機密攤於陽光之下。透過上述看似失敗的模糊地景，本文試圖討論帕格倫「遠距攝影極限」如何矛盾地以模糊的影像質問國家軍事機密；同時，探詢簡要概述官僚體制透過操作秘密——可見的不可見——來企及不可觸碰、不可質疑的崇高。

四十英里厚的氣層

多數歷史上的監控、秘密與軍事主義都存在於美國深處的沙漠，機密的軍事基地與武器散落在遙遠的風景之中。深藏在嚴密管制的軍事範圍裡，且同時以幾十英里限制區域作為緩衝，很少有一般人可以親眼（不使用任何協助設備）看到這些管制區域。¹

多半位於美國西南部，像是加州、新墨西哥、內華達與猶他等，深藏於曠無人煙的沙漠之中、軍事工業複合體下的美軍基地，既不允許公眾進入，也禁止民眾拍攝。但弔詭地，我們可以輕易的google到化學武器實驗地猶他州道格威的座標與用途，但我們無法親眼目睹內容與流程，抑或質問與干預。像是現代保險箱的形式與觀念，它多半放置在一目瞭然的位置（可能在衣櫃或是老闆的辦公桌後），然我們僅能望著秘密的形式，揣測內容。換言之，軍事基地是一公開透明的秘密，可視又不可見。

以國家安全為名的秘密，正是帕格倫的遠距攝影所探測的極限。在可接收與無法偵測、秘密與揭露之間，讓他以天文望遠鏡作為輔助，自仰望到俯瞰，觀測地景。技術上來說，藝術家使用了焦距一千三百至七千公釐的極高倍率天文望遠鏡，這樣的倍率可以將肉眼無法辨識、地表上總總細微、掩蔽之處都看得一清二楚。然而，儘管在天文望遠鏡的輔助下，《生化武器試驗場所》裡的所有細節、自然與人造物的邊緣，依舊模糊到令人不敢置信。這層模糊並非偶然，系列下的其餘作品，如《開放式飛機棚》(Open Hangar; Cactus Flats NV; Distance 18 miles; 10:04 am, 2007) 或是《收割者偵察機》(Reaper Drone; Indian Spring, NV; Distance 2 miles, 2010)，無論是最遠的四十

¹ Trevor Paglen, Limit Telephotography, <https://paglen.studio/2020/04/22/limit-telephotography/>

二英里、或僅僅二英里間的距離，影像都是一片朦朧：建築物與無人機都消散為抽象的色彩與形式。

除卻遠距的因素干預（政府對可拍攝區域的限制），模糊的原因也來自蒸騰熱氣的柏油跑道。在距離與環境的雙重遮罩下，「遠距攝影極限」系列中呈現的抽象表徵並非美感上的選擇，而是攝影的極限。換言之，這是帕格倫對攝影與其宣稱真實的壓力測試，也是對影像與詰問權力間的交叉質詢。仿若放大絕般的荒謬攝影手段——像是天文學者投向黑夜探尋肉眼看不到的星群一樣，拿起天文望遠鏡對準了地表遠方熱氣蒸騰的軍事基地，最終仍是一片模糊：「地球與土星間（五百萬英里遠）之間有著五百英里寬、厚厚的氣層²。相反地，此處，觀察者與軍事基地間有著四十英里厚的氣層。」我們無法因為模糊指責帕格倫拍出了失敗的影像。如果攝影所宣稱的真實，一部分來自將被隱藏的秘密攤於陽光之下，那麼，帕格倫的作品同樣揭露了秘密，甚至以一更本質的方式進行揭露——模糊本身即是秘密的形式。

論官僚系統的崇高

康德在《判斷力批判》（*Kritik der Urteilskraft/Critique of Judgment*）裡曾以自然女神伊西斯（Isis）神殿上的銘文為例，來解釋何謂崇高：「我是現在、過去，以及未來，而我的面紗不讓任何世俗之人揭露。」³觀察者與軍事基地間四十英里厚的氣層，正是這層尋常百姓無法揭露的面紗。朦朧的生化武器實驗場、停機棚等是秘密作為權力展演與操作後的抽象表徵。與我們的常識相左，權力不僅有效於清晰的範疇：白紙黑字的法條、象徵禁止的符號，或者已內化成為我們意識形態的鄉民用語「有圖有真相」；更進一步地說，權力在模糊的領域裡更為崇高，「正是語言中先天的『模糊』讓它保有能動性，而得以運用在各式不同的情境中」⁴。

沒有比民族主義之下、以國土安全為由的官僚機構，更懂得操作模糊、玩弄秘密以抵達崇高。官僚系統的崇高，其環環相扣的結構、層級與部署，形式化於帕格倫鏡頭下的模糊影像，或藝術家賽勒斯（Jamal Cyrus）在作品中對FBI反情報計畫（於冷戰期間對國內執行）中加密文件的形式援引：已公開的文件中總有無數的被塗黑的文字。又或者，此處，再讓我們援引在地的例子：洪仲丘事件中，被戲稱為「國防布」的台灣軍事結構下之監視系統。然則，與其說官僚系統的崇高在於保存秘密，倒不如說，崇高仰賴於對秘密的操作——既是意識形態上的玩弄，也是表演儀式。上述的例子裡，沒有任何一項秘密是真正的、幾乎無人知曉的秘密，相反地，這些秘密是公開透明的隱蔽。我們知道軍事基地的位置、有權調閱監聽文字紀錄或是監視錄影帶，但總有各式面紗——儘管性質各異，卻都固執的有著相同目的——編織屬於潛規則的層級、組織模糊的網絡，讓我們對權力的叩問，總在荒誕的情狀下戛然而止。

因此，帕格倫的「遠距攝影極限」，並非單純地以攝影挑明權力與秘密間的二元關係：可知與不可知，揭露與掩蔽；而是以模糊的影像展露秘密的形式，說明官僚機構的崇高來自於對秘密的操作。它擺盪於公開與隱匿間：在強調公開透明的前提下，組織且程序化秘密的層級。不過，可視的不可見性總是充滿意外與不確定。我們知道秘密的位置，卻沒有看清的把握。就像是我們讀著帕格倫明晰的文字標記，卻只能想像與揣測眼前抽象的形象；就像藝術家窮盡拍攝的方式，卻發現遙遠的星

² 同上註。

³ Immanuel Kant, *Critique of the Power of Judgment*, ed. by Paul Guyer, trans. by Paul Guyer and Eric Matthews, (Cambridge: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, 2000), 194.

⁴ 李立鈞，〈模糊的歷史：模糊的圖像常常不就是我們需要的嗎？〉，非池中藝術網，網址：<https://artemperor.tw/focus/4107>，2021。

群，較地表上的軍事基地更容易企及。不過，也是在這愚勇之下，我們得知了這層面紗的存在。沒有世俗之人可以將這面紗揭露，但我們總能不斷嘗試。